

本书简介：上世纪六十年代，在中国甘肃河西走廊，发生了一起被列为全国第四大案的“右派反革命集团案”，共逮捕了43人，判刑25人，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枪毙2人，与本案有关的林昭亦不幸遇难。为什么大学师生会沦为阶下囚？为什么共产党县委书记、委员成了反革命？为什么老实种地的农民成了凶神恶煞的暴徒？本书将作出回答，既是历史的真实记录，也是受害人血和泪的控诉！

求索

——兰州大学『右派反革命集团案』纪实

谭蝉雪 编著

求 索

——兰州大学“右派反革命集团案”纪实

谭蝉雪 编著

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

书 名 求 索

——兰州大学「右派反革命集团
案」纪实

编 著 谭 蝉 雪

出版发行 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

香港上水新成路一百二十三号三楼

电话：二六七〇六六三三

传真：二六七〇一三八二

印 数 一千五百

版 次 第一版

定 价 人民币二十元

出版日期 二〇一〇年二月

ISBN 978-962-450-626-6/D.53009

心是颤动的，血是热的， 灵魂是圣洁的

——谭蝉雪：《兰州大学“右派反革命集团案”纪实》序

钱理群

这是一本血写的书。这是一本拷问我们灵魂的书。这是一本期待已久的书。

我们早就从已经成为民族圣女的林昭的叙述里，知道她有一群来自大西北荒原的战友：他们共同编印了《星火》杂志，在“万家墨面没蒿莱”的黑暗中发出反抗的希望之光，却因此而罹难。我们永远怀想他们，更渴望知道：这是怎样的一群人？他们当年究竟发出了什么声音，让执政者如此恐惧，非除之而后安？他们给我们后人留下了怎样一份精神遗产呢？

本书的编著者谭蝉雪，是其中的幸存者，她也因为人们这样的期待而感到责任的重大，经过近三十年的苦苦追寻，终于在有良知的朋友的帮助下，找到了《星火》的原稿，并且和同为难友的向承鉴先生分别写下了自己泣血的回忆。被淹没了整整四十九年的历史的真相终于得以呈现，我们终于得到了这本拿在手里都会颤抖的好沉重的书，我们将如何面对呢？

（一）在理性支配下走向地狱

让我们首先进入历史。

我的耳旁响起了林昭的声音——

“我应该在那里，

我应该和自己的朋友在一起！”

不仅是和已经先行的朋友在一起，更要寻找新的战友。林昭说：“‘天涯何处无芳草’！时代思潮如是一种超越空间的存在，更不如说作为一个‘阶级’的这些人本身之间便有深刻的共性”。

林昭引人注目地提出了“时代思潮”和“阶级共性”的概念，也就是说，身在江南苏州水乡，并且是北京大学 1957 年《广场》传统继承人的林昭，和大西北腹地兰州大学的以张春元为首的右派学生，是因为共同的时代思潮，或者说是面对共同的时代问题而聚集，因为相同的阶级共性而形成“平等的联合”的。我们的讨论，就从这里展开。

说起“阶级共性”，自然要想到他们共同的身份：1957 年的“右派”。其实，包括林昭在内，他们都是稀里糊涂地被戴上“右派”帽子的，他们只是凭着出于本能的正义感，发表了当权者不愿意听到的意见，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“阶级利益”所在，更没有自己的自觉的“阶级立场”。他们的真正“阶级意识”的形成和建立，是在成为右派以后。也就是说，是反右运动把他们造就成了具有阶级自觉的反抗者。马克思曾经说过，资本主义为自己培育了掘墓人；我们也可以说，专制体制发动的反右运动也为自己培育了掘墓人；这大概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喜欢说的“历史辩证法”吧。

本书的编著者说得很对：“到了农村，才知道真相，才明白了是非”。这就是说，张春元、谭蝉雪、向承鉴们是在中国的社会最底层的农村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的，这是意义重大的。而且他们之到农村，不同于五四之后的民间运动者（也包括今天的志愿者）以改造农村为己任去农村，因此难免居高临下的姿态，他们是以戴罪之身来到农村接受强制改造，实际地位比农民还要低。因此，也就直接承受农民的一切苦难，面对更加赤裸裸的农村真实，更有机会接受和体察农民的内心感受，在某种程度上，农民面对的问题与命运已经内化为他们自己的问题和命运。同时，他们又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青年，因此，也有可能更加理性地来思考农民问题和农村问

题。

更加重要的是，他们是在中国农村最严峻的时刻来到那里的。因此，他们亲历了大跃进的狂热，浮夸，直接体验了大破坏造成的大饥荒，目睹了成片成片的农民的死亡和“人相食”的人间惨剧。谭蝉雪只要回想起她的房东老大爷直挺挺躺在床上活活饿死的情景，就仿佛听见大娘凄厉的哭喊声，心都会流血。她说：“在血淋淋的事实面前，我能无动于衷吗？我能视而不见掉转头去捧着书本吗？”

这就说到了更为本质的问题：这些 1957 年的热血青年，血还是热的。这很不容易，极其难能可贵。因为超乎人们承受能力的现实苦难，早就把许多人从肉体到精神都压垮了。如谭蝉雪所说，即使是当年的右派，也或是努力改造，天真地等待重返校园，或是苟且活命，无可奈何地混日子，或是看穿世事，流落天涯，更有堕落而成为告密者，借出卖难友而自救，真正坚持理想，继续探索真理，为国为民之心不变的，已是凤毛麟角。万幸也不幸的是，林昭和她的战友张春元、谭蝉雪、向承鉴们，正是这样的一群不合时宜者。在今天许多人看来，这都是不可思议的：他们蒙冤受难，自身难保，却偏要怀着“国家与民族的命运不能葬送在我们这一代手里”的历史责任感，主动承担解救民族灾难的重任。谭蝉雪说：“我感到责无旁贷，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的人，任何一个流着热血的人，都不能在这样一个现实面前无动于衷，忧国忧民是现实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。有人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：这样做是为了什么？答案是：为了祖国的命运！为了拯救千千万万濒临死亡的老百姓！”这是怎样的精神境界！向承鉴说得好：“心是颤动的，没死；血是热的，没冰；灵魂是圣洁的，不脏”，就只能有这样的选择。“‘不在沉默中爆发，就在沉默中死亡’，我选择爆发”，“我义无反顾地走上普罗米修斯取火之路。如果说五七年我是百分之百毫知觉地落入陷阱；那么，如今我是在百分之百理性的支配下走向地狱，无怨无悔”，“我不下地狱，谁下地获；这世道又与地狱有何区别？为了自由和尊严，为了颤

栗流血的心得以平静，我选择了死亡，十分清楚它的严重性和后果”。

历史将记下这一笔：在“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危急的时刻”（向承鉴说），正是这些已经被打入地狱里的右派，林昭、张春元、谭蝉雪、向承鉴们挺身而出，维护了理想、真理，维护了人的自由和尊严。如果没有他们，这段历史就只剩下了卑劣的屈辱和沉默，我们将无法向祖先和后代交代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林昭和她的《星火》战友们是拯救了我们民族的灵魂的，他们才是鲁迅所说的中国的“筋骨和脊梁”。但也正如鲁迅所说：“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，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毁，被抹杀，消灭于黑暗中，不能为大家所知道”（《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心了吗》）：这又是我们民族的最大悲哀。

（二）我们是农民的儿子

更加可贵的是，他们对自己历史使命的清醒体认和充分自觉：“我们是老百姓的代言人，要把他们的疾苦，他们所受的压迫，他们处于水深火热状态揭露出来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。仅仅这样还不够，作为一个觉醒的知识分子，还要从理论上去挖掘这一切祸害的根源，去探讨解救祖国命运的途径和方法”。他们正是怀着这样的目标，聚集在《星火》里的。这就意味着，这批 1957 年的受难者在 1958-1960 年的中国农村的炼狱中，经过了“困惑——悲愤——求索”的思想历程（向承鉴语），终于成长为有着鲜明的阶级立场，明确的战斗目标的自觉的反抗者。这是一个林昭说的因“阶级共同性”而集合的群体。

那么，在六十年代的中国，他们将代表什么阶级的利益和要求，他们的“阶级共同性”何在呢？我们可以看他们的自我命名。

首先是：“我们是农民的儿子”。他们最为关注，要不断追问的，是农民的命运，这是他们对现行体制批判的中心、出发点和归宿。《星火》不仅有直接反映农民心声的《一个农民的口述记录：（三月

的)农村一日》(向承鉴记录),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历史现场实录,而且有张春元撰写的重头文章《粮食问题》、《农民、农奴和奴隶》、《论人民公社》。他们计划将《论人民公社》一文通过各种渠道传给中共从底层到高层的干部,作为他们所要发动的拯救中国的运动的关键步骤。在这些文章里,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:“在我国当前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,矛盾最突出也是最惊人的是农业问题——其实质是农民问题。这不仅因为农民占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,更重要的是农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,将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。农民——即新兴的农业无产阶级,将是我国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社会的主导力量和决定因素”,因此,如何对待农民,是一个是否“背叛人民”,“背叛社会主义事业”的基本标志。“劳动人民,首先是农民的一般生活水平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,收入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,这是我们评论人民公社好坏的重要标准和尺度”。

于是,就有了这样一个基本观察与判断:“当前农村的巨大变化之一,就是农民的贫困与破产,农村中出现了新兴的阶层——农村无产者”。

他们要追问的,正是导致农村惊人的贫困,农民无产化的原因。

在他们看来,首先是对农民的经济剥夺。“在农业集体化的口号下,残酷地、变相地把农民的生产资料,如土地、耕畜、农具、种子等间接地进行控制,对农民的生产所得,如粮食、油料、棉花等千方百计地进行掠夺。尤其是人民公社化以后,大大地加速了广大农民向农村无产者过渡的进程”,农民“丧失了对一切生产资料的使用权,变为生产资料的附属品和会说话的工具”,也彻底“丧失了对生活资料的享有权,生产的产品完全不归自己支配,不能保留与分得生活所需的起码数量”。

其次,是对农民政治和人身自由的剥夺:“用分化、利诱、胁迫、强制等手段,把农民用军事组织形式编制起来,加强统治,扼杀和堵塞了农民在迁居、就业、外出谋生的起码要求和道路,在人身自

主和自由方面没有丝毫权利”，“当代统治者所说的一切公民权利，如选举、集会、结社、游行示威、言论自由等等，对于农民来说，完全是骗局”，政治、人身自由的剥夺，就“给农民戴上了无形的枷锁”，把农民“牢固地束缚在土地上”。

其三，是对农民精神的控制：一方面，“玩弄着亘古未有的愚民政策，把自己扮演成农民利益的唯一、真正的代表者”，一方面，又在农村进行所谓“反右倾”运动，“打击对农民疾苦略表同情的人”，他们“主要是农村基层干部，来自农民家庭或本人就是农民，和农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”，实行政治思想上的“高压政策”，就使农民完全发不出自己的声音，只能任凭宰割。

他们还要追问，对农民经济、政治、思想的全面剥夺、控制背后的经济、政治原因。因而首先对国家的工业化发展路线提出质疑：“大搞与国计民生不相适应的工业建设，因而在积累资金、市场销售、产品收购、工农业发展速度和相互关系等问题上，采取了一系列侵犯农民利益的措施”，其实质就是用对农民进行“超经济、超政治的剥削和统治手段”，来实现国家工业化。被质疑的，还有当时所推行的对外援助、外贸政策：“用‘援助’、‘救济’、不等价交换等名目，表示自己的‘大方’和‘慷慨’”，“企图扩大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影响，装出一付纸老虎相”，实际形成了对农民的更大压榨，而完全违背了“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首先是满足本国人民的需要”的基本原则。

更要质疑的，是国家体制和农民的关系，更要追问的是，农民在国家体制中的实际的，而不是口头的地位。回答是严峻的：在人民公社体制下，农民实际处于“国家奴隶”即“农奴”的地位。

造成农民的绝对贫困的原因，还有“违反客观规律的大跃进，给农业生产带来的惨重的损失”；“兴修不切实际、不获实利、劳民伤财的水利工程；浪费劳力，朝改夕变的农业技术改革；费人费钱的地方工业；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征用，农村劳力的紧张，田亩荒芜”，等等，都把农业生产和农民逼到破产的绝境。

这就必然涉及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：中国革命本来“实质就是农民战争”，并且是在农民的牺牲、支持下取得胜利的，党内“百分之八十的人出身于农民家庭”，党的力量就在于和农民的“休戚相关、血肉相连的联系”；现在却用超经济、超政治的剥夺手段“对待自己过去的哺育者”，这无异于一种自噬和自杀。这是一个必须正视的现实：由于把不被接受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强加在农民头上，党和广大群众，特别是农民“处于严重的对立”状态，这是一切“真正维护党的利益，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人，都不能无动于衷，都不能袖手旁观”的。

这就必须要说到被《星火》同仁称为“真正的共产党人”，1958年曾是他们所在的武山县县委常委、书记处书记兼城关公社第一书记的杜映华，他后来因为支持并参与《星火》活动而被捕，最后和张春元一起被枪决。他出身于农民家庭，1949年以前，就学于陇西师范，秘密加入共产党，领导过学生运动，革命胜利以后，担任过土改工作队队长，漳县县委副书记。向承鉴在回忆录里，这样谈到他眼里的杜映华：“杜映华和我一样，至死不忘自己是农民的儿子。身为‘书记’，始终一身农民打扮，穿着不整不洁，一双老布鞋，浑身农民的‘俗气样’，显出普通和平凡”。在大跃进的全党全民、从上到下的狂热中，他始终保持低调，坚持“脚踏实地，量力而行，切切实实办点有益事”，他坚守的原则是“心里想着人民，想着农业和农民，做事就不会出格”。但他却因此而罹难：在庐山会议以后的“反右倾”运动中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。这反而激起了他对党和国家命运的忧虑和思考，因而和同样忧国忧民的“右派”一拍即合。他在和向承鉴的一次彻夜长谈中，这样倾诉内心的困扰和痛苦：“革命胜利了，我们给农民带来了什么？是饥饿！是死亡！历来封建统治者对反抗它的人，都施以无情的镇压。蒋介石不知道屠杀了多少共产党人，但社会上还有不同的声音，例如鲁迅的声音，中国共产党的声音。现在一切不同的声音都没有了，变成一个鬼话、假话世界！明明在天天饿死人，还要逼人天天喊形势大好。古今中外，绝无仅

有。我不知道世道为何变成这样,变得如此快?”应该说,有类似杜映华这样的困惑的共产党的干部,当时并不在少数,而且各级都有;但他们大多以“维护党的大局”为理由而“说服”了自己,保持了沉默。其实他们所要维护的“大局”,不过是党的执政地位,而执政地位的背后,就是既得利益。这就是说,当农民的利益,人民的利益和党及自己的既得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,几乎所有的共产党的干部都选择了后者,尽管许多人内心依然充满矛盾。杜映华令人尊敬之处,就在于他完全突破了一党专政的逻辑,而坚守了自己的作为“农民的儿子”的基本立场,坚持了为劳动人民的谋求幸福和解放的原初理想。向承鉴说他是“一个胸中始终装着人民痛苦的人”,这确实是一个衡量是不是真正的革命者的基本标尺,他也因此“永远是个高尚的人,值得人民纪念的人”。

(三)要“民主社会主义”,不要“国家社会主义”

这些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右派,他们所接受的教育,决定了他们都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奉者。因此,当他们面对严酷的现实,思想上出现了“无休止的问号”时,首先是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去寻找思想资源,据向承鉴回忆,他就曾经猛读马克思主义著作,大有收获。给予巨大启发的,还有林昭传给他们的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(草案)》,也就是说,他们试图从国际范围的社会主义改革运动中获取精神支援。这样,《星火》群体的思考,当然首先是面对国内问题的,但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国际视野。

因此,我们注意到,在具有纲领性的《目前形势及我们的任务》(向承鉴)里,对国际形势所作出的两点分析。一是强调帝国主义“企图恢复和扩大它们的霸权”,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、自由的斗争正在发展,“局部或由局部而导致大规模战争的危险性依然存在”,但也“越来越可能克服新战争的威胁”;另一方面则强调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,和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变质(在他们看来,中国是一

个典型)而导致的社会主义危机,由此提出的建立对“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”的问题具有解释力和批判力的理论的迫切性。这样的分析,实际上就确立了《星火》群体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国际国内形势下的两大基本立场:一方面,坚持社会主义立场,警惕和反对帝国主义的霸权,支持殖民地人民斗争;一方面,面对社会主义的分裂与危机,坚持“真正的社会主义”(这是1957年北大校园民主运动提出的口号),批判变质的社会主义。

于是,就有了如下《自白》(向承鉴):“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使工农劳苦大众幸福、人人平等、自由的社会,目前我们的口号是:和平,民主社会主义,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,最终目标是要实现共产主义”。

同时提出的任务是:“填补马列主义学说在阐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理论空白,发展科学的马列主义学说,以指导我们的行动”(《目前形势及我们的任务》)。

作为这样的理论建设的第一步,也是出于现实斗争的需要,他们在《放弃幻想,准备战斗》(顾雁)、《目前形势及我们的任务》(向承鉴)、《论“政治挂帅”》(何之明)、《思维与存在同一性》(何之明)、《告全国人民书》(向承鉴)等文章里,把重点放在了对中国现行体制的分析和批判。

于是,就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基本判断:中国现行社会主义体制实质上是一种“由政治寡头垄断的国家社会主义”。

在他们看来,这样的“国家社会主义”具有以下特征:

首先是“国家集权”,“其实就是党的绝对领导”,在“党政不分”的党国体制下,实行党控制下的国家对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社会、生活……一切方面的全面权力的高度垄断。

其次,在权力垄断的基础上,形成“新兴的官僚统治阶层”。论者认为,这样的官僚阶层,“在(19)57年之前就已萌芽,但在57年后,它的特征才清楚和完美起来”:“在政治上,精神上和經濟上都享有特权”。

其三,少数人享有特权的另一面,就是其他阶层人民,特别是工农基本群众基本权利的被剥夺,基本利益的被侵犯,处于被欺压、掠夺和奴役的地位。“工人精神和体力终年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,过高的劳动定额,使他们失去了应得的劳动报酬”。而在人民公社体制下,农民实际上已经成了“国家奴隶”或“农奴”。

其四,这样的权力高度垄断,必然形成“政治寡头”的统治,提倡“偶像迷信”,压制党内外民主。

其五,寡头政治一面必然导致“思想垄断”,“思想的强化统治”,一方面则必然导致“反动的主观唯心主义”,“胡作非为的能动性”,其结果就是任意执行“违反客观规律、脱离物质基础、脱离现实的反动政策,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和紧张局势”,造成了“工农业生产力的全面的毁灭性破坏”,给国家与民族带来了极大灾难。

面对“国家社会主义”体制造成的政治、经济的全面危机,《星火》所表现出的历史和社会责任感,高瞻远瞩的眼光,政治和思想的坚定性,理论的批判力量和行动的勇气,确实构成了那个时代的一道“天火”,照亮了现实的黑暗,也为未来播下了火种。

因此,历史也应该记下这些日子:1960年元月,《星火》第一期油印出版,16开本,仅印三十多份。1960年9月,《星火》全体人员和支持者、相关者全部被捕,共43人,后判刑25人,已经准备好的《星火》第二期也因此未见天日。1968年,林昭遇害。1970年,张春元、杜映华同时殉难。

(四)盗火者普洛米修士和永生的海鸥

对这样的“结局”,林昭和她的战友,是预料之中的。如向承鉴所说:“在写这些文字之前,我已做好了为真理献身的准备”。因此,他们早就为后代留下了遗言,为历史绘制了自我形象。这就是林昭在《星火》上发表的两首长诗:《普洛米修士受难的一日》(第一期)和《海鸥——不自由毋宁死》(第二期)。前一首已经在为林昭所唤

起的朋友中广泛流传,后一首是第一次公布于世,相信会引起更大的关注。

在《普洛米修士受难的一日》里,引人注目地写到了寓意深长的对话和呼唤。

在普洛米修士面前,诸神的统治者宙斯竟感到“刺促不安”：“他到底保有什么力量？竟足以威胁神族的生存。”于是,普洛米修士和宙斯之间就有了这样的对话——

“你可以把我磨碎,要是你高兴。

但是救不了你们的恶运”。

“你的头脑是不是花岗石？”

“不,是真理保持了它的坚贞。”

“这么说你要与我敌到底？”

“被你认作敌人我感到光荣！”

普洛米修士遇难了,宙斯竟“不感到复仇的欢欣——一种阴冷的、绝望的恐惧,深深盘踞在他的心胸……”

而普洛米修士在临难那一刻,却在对“人”呼唤——

“今晚,有多少人在灯下奋笔,

记载人民的苦难和觉醒,

多少人正对灯拔剑起舞,

火光映红了多少颗急跳的心。

人啊！我喜欢呼唤你,响亮的

高贵的名字,大地的子孙,

作为一个兄弟,我深情地

呼唤:人啊！我多么爱你们！

你们是渺小的,但是又伟大;

你们是朴拙的,但是又聪明;

你们是善良的,但是当生活

已经不能忍受，你们将奋起斗争！

人啊，众神将要毁灭，而你们
大地的主人，却将骄傲地永生！”

《海鸥——不自由毋宁死》写的是一个悲壮的故事：一位“殉难者”，“最最勇敢的战士”，“在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中”，失败后投身大海，“从容自若地迎接了死亡”……

“那是什么——囚人们且莫悲伤，
看啊！就在年青人沉没的地方，
一只雪白的海鸥飞出了波浪，
展开宽阔的翅膀冲风飞翔。

这是他，我们不屈的斗士，
他冲进死亡去战胜了死亡，
残留的锁链已沉埋的海底，
如今啊，他自由得像风一样”。

这令所有“宙斯”恐惧的，在临难时呼唤“人”的永生的普罗米修士，这“冲进死亡去战胜了死亡”的“斗士”，这“自由得像风一样”的海鸥，都融入了林昭、张春元、杜映华的生命，同时也闪现着所有《星火》受难者、幸存者的身影。

他们就站在这里，逼问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良知——

你的心是颤动的，还是死的？你的血是热的，还是冰的？你的灵魂是圣洁的，还是脏的？

2009年12月21日-28日

（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，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，已退休）

前言

这是一段尘封了半个世纪的史实，一群在民主、自由征途上跋涉的青年，一桩以青春和生命为代价的冤案，一声来自社会底层的呐喊！

当纪念林昭的文章发表以后，有人曾问我：为什么你们那边不见动静？例如彭令范在《我的姊姊林昭》后记中就提出：“还有那些林昭的‘同案犯’，和当时进行所谓‘反革命活动’的一些同志、朋友和叛徒却默默无声，我希望他们也能讲一些心里话。”是关心，也是一种责备！作为劫后余生的我，何尝不想早日执笔而书，但两手空空，什么资料也没留下，不像林昭幸运有亲人和挚友保存着有关材料，而且还抢救出了一些资料。而我们都同时被关进牢房，出来后除了一纸判决什么也没有，当年的事情虽然历历在目，却也只能记得大的情节，经过几十年具体细节已模糊了，例如关于《星火》，最多能把篇目回忆起来，其中的文字内容谁也无法记清。回忆也只能局限在个人的范围内，对于整个案件及有关人员的情况就无从下手。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设法查找资料、积累资料才是切实可行的办法。

八十年代以来，我就苦苦寻找，结果是到处碰壁，一提起当年的事就“谈虎色变”，“左”的思潮仍弥漫在祖国的大地，“反革命”的卷宗不许动，“反革命”的阴霾仍在作怪。我曾经质问：那平反算什么？回答是“王顾左右而言他”，平反与查阅档案那是两回事，二者不能混为一谈。怎么办？苦恼而又无能为力，也有人劝我：算了吧，年事已高，只好记得多少写多少，这已经属于抢救性的了！当然我

可以这样做,但是良心和责任鞭策着我,特别是看到社会上发表的文章,有很多都是捕风捉影,甚至连年代、姓名等基本事实都有出入,我不能坐视不管,我应该尽到最大努力,把当年被列为全国大案之一的真相披露出来,还历史以本来面目。我要不遗余力地继续努力,作为七十多岁的老妪,我奔波寻找……

历尽千辛万苦,也许是这种精神感动了一些好心的、有良知的人,再加上新世纪的到来,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发生变化。我想到了“解铃还需系铃人”,我找到了兰州大学的有关方面,也存在两种不同的态度:一种是冷漠,以几十年前的事他们完全不知道为借口推掉;另一种是出于正义的关心,有的也曾风闻此事,认为这是兰大历史上光荣的一页。在他们的帮助下,再加上其他很多友人的共同努力,终于完成了我的心愿:呈献在读者面前的是当年历史的真实记录,其中有原始的资料,有当事人的亲身回忆,“它来自底层,并踏着自己的血与汗。”(章诒和)岁月可以流逝,但发生过的历史是不能磨灭的,心中的创伤会牢牢地结成疤痕。

这段史实是时代的缩影,是向民主与自由进军的号角,是反封建、反专制的一场鏖战,是黑暗与黎明的搏斗。当年的言行不是个人的异想,也不是事件的偶然,是历史造就的必然结果。逝者如斯,愿其沉淀会促使今后历史的发展!

谭蝉雪

2009年3月